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中国 文化 书 院 编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类

北大校長与中國文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BEIDA XIAOZHANG YU

ZHONGGUO WENHUA

中国文化书院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53,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

ISBN 7-108-00157-8/G·20

定价 2.10元

严 复(1853—1921)

1912年2月至11月任
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1868—1940)

1917至1919年任北京
大学校长。





胡 适(1891—1962)
1917年起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曾任北大文学学院院长，1946至1949年任北大校长。



汤用彤(1893—1964)
1930年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并曾任哲学系主任，1949至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任北大副校长直至病逝。

马寅初(1882—1982)

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经济系主任，并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后任北京大学校长。



翦伯赞(1898—1968)

194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曾任北京大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等职。





季羨林(1911—)

东方语言学家。1946年始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并曾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和北大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图书委员会主任、导师。



陈独秀(1880—1942)

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及北大文科学长。

梁漱溟(1893—)

1918至1924年受聘在北京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朱光潜(1897—1986)

1933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直至去世。



献给北京大学诞辰九十周年
并献给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
北大校长们

书名题字：庞 朴

序一：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 瑶

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视自己为“北大派”而自豪。他认为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要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于是探讨和比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异同，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的文章日渐增多，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

它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进行理论的、思辨的探讨问题的同时，认真考察一下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因为象如何汲取外来学术文化而使之现代化这类重大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前人也曾为此作过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有过艰辛的实践，无论其成败得失，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都是宝贵的。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象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因此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微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我这个想法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的。第一，三十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之后，曾写过一本书，叫做《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通过斯大林来介绍苏联的，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写法是可取的，这本书就写得很漂亮。鲁迅也曾计划用“茶、酒、女、佛”四个字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专章题目，同样是想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的；足见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蒋梦麟

说：“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这里说明了他多年当校长的体会。大学中也确实存在这么三派势力，因此冯友兰对之颇加赞许。但他言犹未尽，值得再深入分析。从逻辑上说，三派势力中两派的联合共有三种可能：其中校长联合学生反对教授一种，事实上没有可能，也从未在任何大学发生过；就北大学生方面而论，不仅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直到今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北大学生首先提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不能设想居领导地位的校长会联合学生来反对教授。至于校长联合教授反对学生的事，旧社会在一些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里的确发生过，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人数很多，集中了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用表彰的口气说是“人才荟萃”，带点贬意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动乱时期的斥之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实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学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体；他们勤恳地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由于年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在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与学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爱护的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全体师生联合起来反对校长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学里也发生过，而且当然是为校长以及有权任命校长的执政当局所最不愿发生的。所以蒋梦麟的经验和体会实际上是从校长的地位考虑的，就是说作为校长，一定要用全力来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如果引起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校长就必然会当不成的。其实这也是当权者在遴选校长时，首先要考虑的

问题，因为选任大学校长毕竟同任用其它政府官员不同，任命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人选在教授和学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必须选择学术地位很高、能孚众望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够体现当权者的意图之外，还能缓和与调整学校内部的关系。就校长本人说，虽然一个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确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所谓“庙小”、“池浅”也不无道理，但它的影响却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因此作为校长，他也必然会珍视这种地位，以学校的名义和声望进行活动。举例说，最初主持京师大学堂校政的孙家鼐，他是咸丰时的状元，光绪帝的师傅，当时声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因此才有设置西学、开办译书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维新派，与康、梁等人不同，他还是近代工业（纱厂）的开创者，因此考察他与维新思潮的衍变关系是符合中国现代思潮的历史进程的。又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实际上当时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学生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教授为主的，校长并没有公开出面倡导，但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仍以校长为主要攻击对象，就因为他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认为大学不仅为“按时授课”之所在，且“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见《答林琴南书》）。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北大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适宜的审视点的话，那么历届校长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等是可以作为北大的社会影响的适当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学生都是群体，其构成比较参差复杂，而校长则为个人，在总体上是代表学校某一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我觉得从历届北大校长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进程这一设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这一设想的着重点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潮，而不是北大校史

的变迁。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鼐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肄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索马寅初在五十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分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去年（1987）纪念八一建军节六十周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论述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纪录片，片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觉得这个片名起得很好！因为无论就哪一方面作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北大也是这样。在今后的年代里，北大当然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发扬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的“校格”，才能无愧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现任北大校长提出要发展基础科学、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它说

明我们的视野已经和过去不同，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我相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在促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北大是一定会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的。

1988年1月5日

序二：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

乐黛云

北大自由精神的奠基者蔡元培校长早就指出：“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也不只是“按时授课的场所”，“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的人格”。他抱定学术自由的宗旨，在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正如梁漱溟先生所回忆：“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①梁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大潮流的酿成，“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于蔡先生的“器局大”和“识见远”。所以能“器局大”、“识见远”，又是因为他能“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

这个“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讲得特别好。大凡一个人，或拘执于某种具体学问，或汲汲于事功，就很难超然物外，纵观全局，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知识分子素有“议而不治”的传统，一旦转为“不议而治”，那就成了实践家、政治家，而不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法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林(Edgar Morin)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1.从

^①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86页。